

文明互鉴视域下

WENMING·HUJIAN SHIYU XIA

中西

ZHONGXI MEIXUE DE
BIJIAO YANJIU

美学的比较研究

◎ 于俏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文明互鉴视域下

中西 美学的比较研究

◎ 于俏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明互鉴视域下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于俏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10-9186-9

I. ①文… II. ①于… III. ①美学—对比研究—中国
、西方国家 IV. ①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530 号

文明互鉴视域下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

WENMING HUJIAN SHIYU XIA ZHONGXI MEIXUE DE BIJIAO YANJIU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0.5

字 数: 175 千字

出版时间: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 蕊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责任校对: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9186-9

定 价: 37.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于俏

- ◎ 出生年月：1979 年 5 月，性别：女，籍贯：辽宁沈阳。本科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旅游管理系，获管理学学士学位；研究生毕业于大连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就任于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旅游管理系，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东西方文化比较、旅游美学、世界遗产、园林建筑与艺术等其他文旅、文创方面。
- ◎ 本人自入职以来，七年间先后承担课程教学总量近 3000 课时，其中承担过旅游管理专业“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西方文化概论”“旅游美学”“园林建筑与艺术”“中国风景名胜”，及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文化资源概论”“文化经纪理论与实务”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本人于 2016 年积极申报并主持了云南省教育厅课题——“云南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市场价值研究”；结合自己的教学内容和专业方向，以独立作者身份先后在《绿色科技》《中外交流》《文艺生活》等专业权威或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曾参加“十二五”规划教材《旅游市场营销》的编写工作并任副主编，工作量 8.5 万字。

引言

关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而他强调“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习近平指出：“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在文明交流互鉴问题上，习近平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夜郎自大，轻视、贬低其他文明、文化，指出这种“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二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认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他还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外两个方面，对外，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对内，既要大力弘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这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对待外来文明和自身文化传统的辩证态度。换言之，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对外来文明、文化一分为二，有批判地加以借鉴和吸纳；又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继承其优秀成果，摒弃其糟粕成分。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制高点上考察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就能获得更加辩证、全面的认识。

中华文明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智慧与追求，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其中和而不同的天下观念是中华文明的基本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历史证明,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主要传承形态,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成果。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人天下观念的现实内涵。自古以来,人类的发明与创造往往会突破民族或国家的界限,能够在相互作用的交流过程中共同获得加速度的发展。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长河来看,19、20世纪中西方都处于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的巨大变动以及人类知识和思维方式巨大变革的趋势中,不过西方的转型早于中国。所以,在与西方学术的交流互鉴中,总体上中国向西方学习借鉴更多、更主动,这在学科分类和话语体系等的现代转型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新体制与中国传统学术全然不同。20世纪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先行的范本,其中,从西方引进现代学科体制和分类系统,包括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系列新学科的诞生,是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美学作为新学科的兴起,其实是18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科系统重新分化、建构的结果,在1750年由德国理性派哲学家鲍姆加登创立。传统中国学术文化中虽然有源远流长、丰富深厚的美学思想,却没有形成现代学科形态的美学。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下,中国现代美学的新传统是依托古代文化传统进行创造性现代转化的结果。它并非自今日始,而是从上个世纪初就启动了,实际上已进行了一个多世纪,至今还在继续。这个古代美学现代转化的过程是与借鉴西方美学密不可分的。中国学者进行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转化,主要靠借鉴西方美学的观念方法,包括概念术语等,用以选择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还要指出的是,中国学者主动借鉴西方,并不是单向度地学习西方,而是同时与西方进行对话、博弈,进行互释、互动、互鉴,目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切实改造和创新转化,努力建构现代美学新学科。在交流互鉴中实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百年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离不开对西方美学的借鉴,但这种借鉴乃是一个首先“学西”、继而“化西”的创造性现代转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是中西互鉴的特殊形态,从而达到中西美学不同程度的创新融合。

中国现代美学主要奠基人之一的王国维,早在20世纪初,在译介叔本华悲观主义意志论哲学著述基础上,撰写了迥异于传统思想的《红楼梦评

论》；借鉴康德美学“鉴赏判断的四个契机说”，首次提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的重要主张，并建构起具有中国传统特质的“古雅”说；借鉴德国古典美学诸家，对中国古典美学尤其是先秦道家美学思想作了深刻反思，自觉把二者加以融会贯通，写出了《人间词话》这一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之作，创建了以“境界”为核心范畴、意蕴丰厚的创新美学体系，对传统的“意境说”作出了具有现代性的创造性开拓。王国维之所以在融通中西上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与他具有超越中西学术二元对立的现代视野有密切关系。

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奠基人蔡元培，在国内最早全面介绍了康德的美学思想，对康德关于审美四契机说，运用儒家思想作了“超脱”“普遍”“有则”“必然”的创造性阐述；从儒家以德为本的思想出发，借鉴康德有关思想并加以吸收融化，同时借鉴席勒的美育理论，强调“涵养德行，则莫若提倡美育”，进而提出了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美育代宗教”说。

梁启超前期以启蒙为宗旨，强调文艺改造人心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诗、文、小说的三界革命论，目的在“新民立人”或曰“移人”；后来借鉴西方哲学智、情、意三分理论，用儒家思想加以化用，提出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中心、以文学艺术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趣味主义”美学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中“趣味教育”一词乃是直接借鉴、改造了西方的提法。梁启超自己也认为：“‘趣味教育’这个名词并不是我所创造，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

其后，中国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着重考量“一是固有的传统究竟有几分可以沿袭，一是外来的影响究竟有几分可以接收”，进行自觉的中西比较和互鉴，达到了对西方美学有选择、有针对性的消化、吸收和融通。这种中国古代美学“化西”式地现代转化并非个例，在一个世纪以来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他们都为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他们中有人提出“以西释中”的口号，表面上抬高了西学，但他们所做的理论探索和创新，实际上超越了“以西释中”，达到了中西互鉴互融的高度。

总之，以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回顾百年中国美学现代建构的历程可以发现，虽然这个时期我们的主动借鉴占主导，但实质上这是特定时代条件下中西文明互鉴的一种特殊形式。当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包含美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中西互鉴的空间更为广阔。我们应该有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立足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时代需要和现实语境，既大力弘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又学习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外来文明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建构符合时代精神的新的美学话语体系方面迈上新台阶。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 / 001

第一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特质 / 001

第二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创作 / 024

第三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欣赏体验 / 033

第二章 近现代西方美学的先进成果 / 051

第一节 西方美学的科学精神 / 071

第二节 西方美学的艺术内核 / 074

第三节 西方美学的思辨传统 / 077

第三章 中西美学的融会贯通 / 084

第一节 中国美学主要体现主体心理要素的和谐 / 091

第二节 西方美学主要体现对象形式要素的和谐 / 094

第三节 中西美学体系的文化范式 / 100

第四章 中西美学的各有千秋 / 120

第一节 “美”的概念的比较 / 131

第二节 艺术的概念的比较 / 138

第三节 “美感”的概念的比较 / 144

结论 / 152

参考文献 / 156

第一章 中国古典美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典美学是指中华民族从先秦时代到 19 世纪中叶近三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建构的传统美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各个历史时期所出现的重要理论、学派及其传承、演变。无论外在形态，还是内在精神实质和历史发展，它都具有区别于西方美学思想体系的显著特点和规律，其内容丰富，风格独特，对人类美学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古典美学萌芽于西周末期，奠基于春秋战国时代，发展于魏晋隋唐时期，终结于清代中晚期。其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历史阶段：先秦至两汉时期、魏晋至唐中叶时期、唐中叶至明中叶时期、明中叶至近代以前的时期。

第一节 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特质

尊崇自然文化精神：一种比较成熟而悠久的文化，总是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尊崇自然是中国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或者说是早期儒、道两家的基本哲学观念。《易经》可谓中华思想文化之源头，儒、道两家代表着中华文化的主干，而这两家都源于《易经》，乃“一源二流”。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学界将哲学分为两大完全对立的派别，非此即彼，要么是所谓唯物主义，要么是所谓唯心主义。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的就是唯物主义；主张精神、意识或理念为第一性，物质为第二性，即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的是唯心主义。

尊崇自然的观念源于对大自然的认识。中华文化的早期哲学体现出的特征就是不研究世界的本原，或者说对物质世界具体构成不做具体探索，

不追寻世界的根本来源，而只注重观察世界的外部形态，从总体上把握事物的全貌，通过对外部形态特征及其变化的观察，从而认识和分析事物的内部运动规律。也就是《周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伏羲氏创造“八卦”正是用的这种“肉眼”观察法。伏羲氏观察的世界是物质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大地，还有蓝天与大地之间的风、云、雨、雪等自然现象以及人群和各种各样的动物与植物。这样说来，伏羲氏“八卦”的创造是有物质依据的，但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同，因为他不涉及世界的本原，只观照世界的表象。伏羲氏根据对复杂多样事物的认识，把握了天地、宇宙的本质存在形式和运动变化规律，并用高度抽象的极其简单的阴（--）阳（—）两种基本符号来表现天地、宇宙的本质存在形式和运动变化规律，创立了“八卦”图形。周文王在伏羲氏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新的“八卦图”。后世学者将前者称为“先天八卦图”，将后者称为“后天八卦图”。无论“先天八卦”还是“后天八卦”，尽管排列有差异，但其基本哲学观念是一致的。

“八卦”符号组合排列揭示了宇宙间的基本规律，如阴与阳的组合，揭示了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阴阳是中国古人创造的一对基本哲学概念。《易经》曰：“一阴一阳谓之道。”阴与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阴阳并非各自分离，实际是“合二为一”，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形象地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说明阴与阳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是根据环境、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

“八卦”还告诉人们，宇宙存在、变化的前提是平衡稳定。平衡稳定规律是宇宙及万事万物的一条根本定律。一事物如要存在，必须维持其平衡稳定，否则就会倾斜甚至倒塌。人体机能长时间失去平衡，则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八卦”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为用，不仅有助于平衡稳定，而且揭示了事物的运动变化，循环无穷规律。从认识事物方法看，“八卦”特别注意从全局和整体看问题、思考问题，注重分析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为用，这与西方重视局部的“解剖”思维方法大不相同。

孔子将“八卦”里的平衡稳定规律发展为“中庸之道”。“中庸”强

调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平衡，是“八卦”图形揭示平衡规律的一种话语表示。“中庸”的基本哲学含义是指事物的平衡稳定。说到底，“八卦”体现的平衡稳定即大自然的平衡稳定。伏羲氏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被黄帝等医学家继承，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理论，而这个理论诊断病人病情的基本方法便是靠“望、闻、问、切”。这四种诊断方法是非常典型的“表象”观察法，通过对表面的观察分析，判断人体内部的病变。由于中医学建立在自然世界的基础上，因而其药物应用也与西方不同，西药多人工合成，而中药大都取自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矿物等物质。无论从人与自然的契合来看，还是从哲学和实践评判来看，中医学在理论上高于西医学。中华民族的哲学渊源尊崇自然，把人事活动与大自然紧紧结合起来，除了伏羲氏、周文王创造的“八卦图”外，还有后来的思想家创造了几个重要的哲学观念，将“八卦”蕴藏的道理加以发挥和阐明，其思维脉络都是对大自然的尊崇。

第一个是“三才”观念。“三才”指天、地、人。《易·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大意是说：从前圣人创作《周易》的时候，是要用它来顺合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所以确立天的道理有“阴”和“阳”两方面，确立地的道理有“柔”和“刚”两方面，确立人的道理有“仁”和“义”两方面。（作《易》者）兼合（三画的八卦符号中）天地人的象征而每两卦相重，所以《周易》的卦体必须具备六画才形成一卦；六画又分阴位阳位，更迭运用柔爻刚爻来布居，所以《周易》的卦体必须具备六位才蔚成章理。

这实际上是把人与大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天、地、人结合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这就说明人的重要性。天有天之道，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不仅有人之道，而且人之道的作用在于“成万物”。天道曰阴阳，地道曰柔刚，人道曰仁义。天地人虽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对应、相互联系的。这不仅是一种“同与应”的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的生成关系和实现原则。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

第二个是“道法自然”观念。人们认识大自然、了解大自然之后，第

第二步是如何利用自然造福人类，对此，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的重要哲学观念。《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即效法或遵循自然，最能表达“道”的一个词就是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也可以说与自然规律或自然法则最相近的一个字就是“道”，这包括自然之道、社会之道、人为之道。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见《汉书·董仲舒传》）的观点依然是对大自然的尊崇，“天”就是自然界。任何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自然模式，谁顺应了这种自然模式就会与外界和谐相处，谁违背了这种自然模式就会同外界产生抵触。所以在这里蕴含了我们看待世界的基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第三个是“天人合一”观念。在继承易学、尊崇大自然的基础上，思想家们创造了“天人合一”观念。“天人合一”最早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

《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曰：“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很明显，两位哲人都把人与天结合在一起。大自然是人类的父母，因而人类一定要尊崇大自然；人类和大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人类如能尊崇大自然，顺应大自然，和大自然和睦相处，就算是天人合一了。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黄帝内经》天道观的目的所在。

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很难找到像中华民族这种具有非常鲜明系统且有无数的思想家发扬光大的尊崇自然的哲学观念和理论。西方早期哲学探索世界的本原，如伊奥尼派的“水本原说”“气本原说”“火本原说”；毕达哥拉斯派的“灵魂观说”“数本原说”等，都是集中探索宇宙是怎么来的。柏拉

图是西方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主要精力在“分离说”“四线段”“理念”等概念上纠缠，离具体的自然物甚远。柏拉图尽管曾经在学校讲授自然科学，但只限于具体的知识，而没有观照整个自然界，更没有对整个自然界做抽象的思维总结。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亦是如此。这些古希腊的思想家更没有如伏羲氏、周文王的思想受到众多学者的承传并形成潮流，而是被后来诞生的基督宗教取代。取代不是机械的，而是相互有融合，但是，后来的数千年，基督宗教是西方思想的主流。在政治上，罗马教廷曾直接介入政治管理长达数百年时间。即使到了科技昌明的现代社会，西方人信仰宗教的人十分普遍。

尊崇大自然和信仰宗教之“神”是一对矛盾，而在中国，宗教这个“神”从未作为国家管理的“利器”。数千年来，中国人信仰宗教的是极少数。他们信仰什么呢？就是本民族中的圣贤与豪杰。诸如伯夷、叔齐、周公、介子推、屈原、曹娥、孔子、孟子、关公等。而对于一代一代的知识分子，孔孟等先贤就是他们心中的“神”。皇权时代中国“文庙”供奉的儒家先贤达到近 200 人，这是多么丰富的文化精神道德偶像。可见，中国人的信仰，其人文精神十分强烈，可视可感。

有人说，中国人也信仰“神”，的确如此，但是，中国人信仰的“神”与西方的“神”不可相提并论。西方的“神”是宇宙的诞生者、创造者，而中国人心里的“神”的本质依然是大自然这个物质世界。比如，中国人心中最大的“神”就是“天”，即所谓“天神”。董仲舒的“君权神授”里的“神”就是天。

中国人尊崇自然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精神闪烁着理性和真理的光芒，是伟大的，不朽的，值得千古继承、万代弘扬，并值得在世界范围内学习、传播、运用。其主张柔性文化精神：用中国阴阳哲学观念评判，“柔性”属于“阴”，在很多的场合下，“柔性”和“阴柔”都是同义语，因而会多使用“阴柔”这个概念（不过，其含义与“柔性”一致）。与“阴柔”相对应的是“阳刚”。一般来说，凡是剧烈运动着的、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明亮的，兴奋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着的、内守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沉默的都属于阴。以天地而言，天气轻清为阳，地气重浊为阴；以水火而言，水性寒而润下属阴，火性热而炎上属阳。阴阳在与上与下、天与地、动与静、升与降等情态对应中，上为阳，下为阴；天为阳，地为阴；动为阳，静为阴；升属阳，降属阴。

古人认为，柔性文化精神里蕴藏着强大的力量，不是那种具体的力量，也不是那种短兵相接的力量，亦不是单个的如英雄、武士般的力量，更不是物质、技术力量，而是“道”“规律”的力量，是真理和正义的力量，是先进和优秀的道德人格力量，是一种无形的抽象的力量。所以孟子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篇》）老子对柔性文化精神力量无限强大有深刻的认识，他的观点是“柔能克刚”“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道德经·第四十三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第七十六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道德经·第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七十八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繹然而善谋。”《道德经·第七十三章》：“不争”便取得胜利，实在是绝顶高明！“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脰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出自《道德经·第五十五章》。

西方人对物质世界浓厚的兴趣早在希腊时代就开始了，产生了一批研究自然界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和中国的儒学一样，是积极“入世”学问，其“理念”的哲学概念里充满对“正义”的设计和规范，渲染着阳刚文化的氛围。人文主义是文艺复兴核心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也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初形式。它肯定人性和人的价值，要求享受人世的欢乐，要求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推崇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毫无疑问，人文主义是一种阳刚文化的思潮。对西方阳刚精神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圣经旧约》，《圣经》中的“新、旧二约”展现的文化精神截然不同，《圣经新约》具有宗教的品质，劝善行良，而《圣经旧约》却用很多很大的场面宣扬暴力。中国文化宣扬“以德报怨”，而《圣经旧约》宣扬的是燃烧熊熊复仇（或征服）的火焰，而且其复仇（或征服）带有毁灭性、灭绝性。

从生存原则看，柔性文化精神立意高深，取法大自然，不争强好胜，不称王称霸，平静，平和，安详，静穆，内守，谦虚，谨慎，有益于保护生命的安全，所以中国成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无数大劫而民族不亡，与柔性文化精神关系极大。

从哲学观念看，柔性文化精神并非放弃力量，而是将力量蕴涵在无形的世界里，这种力量是缓慢的，却很柔韧，可以收到“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效果；这种力量是博大的，如江河之澎湃，如海洋之宽广。试想，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面前，雄劲的高山又算什么呢？

从发展智慧看，柔性文化精神从长远、全局、大处着眼，不争一时之胜，不逞一时之能，是看不见的大包围战略，局部的一切活动都要以不损害长远战略为前提。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使用文明的手段而非战争的手段化解矛盾。数千年来，中华文化缓慢向四周浸润，正是柔性文化文明博大精深的体现。

从人类社会秩序的建立看，柔性文化精神有益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柔性文化精神的温情、温婉、含蓄正是具有这样的魅力。如果未来世界呼唤和平、和谐社会，避免战乱，构建平安群体社会秩序，大力传播中华民族创造的柔性文化精神应是最佳的方法。

一、中国古典美学之和谐精神

中国古典美学讲究和谐，和谐不是同一重复，而是众多因素对立的统一，可高度概括为阴阳统一、刚柔统一。这种统一不强调部分与部分或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统一，而强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统一。这种和谐由于做到恰到好处，所以又称之为“中和”。中华民族十分重视天人合一之美，孔子观东流之水，喟然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儒家和谐概念划分成六个层次，即太和、中和、人和、义和、协和、共和。在儒家看来，整个宇宙的“和”称为“太和”；宇宙中事物本性的“和”为“中和”；以中和为基础，人心平气和称为“人和”；讲道义，注重公共利益的分配为“义和”；在协调义和的过程中，国家达到和谐为“协和”；整个大同世界的和谐为“共和”。因此，和谐是多维的，涉及人与自然中的很多种关系，实现它需要很多方面的关心、参与和担负责任。

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大同”和谐社会的理想，一直是中国

古典美学的主调。孔子提出“天下归仁”的思想，指出“仁”的主要含义是“爱人”（《论语·颜渊》），而实现“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泛爱众”（《论语·学而》）。此外，儒家的“和为贵”（《论语·学而》）与“致中和”（《礼记·中庸》）思想，形成了杜甫以儒学为框架的“民为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安定和谐的社会理念。《礼记·礼运》中所提出的“天下为公”及“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大同社会理想，也是当今和谐社会的理想世界。除了儒家的思想资源以外，道家文化的“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顺物自然”（《庄子·应帝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释家文化中“众生平等”（《大般若经》卷三五）“普度众生”（《普曜经》卷三）的慈悲思想及墨家文化中“兼爱”“非攻”（见《墨子》中《兼爱》《非攻》篇）的和平理念等，也从不同的思想层面为和谐美学精神提供了精神滋养。

在中国的古代审美思想中，“和”作为一种美学观念很早就被运用在仪式中。中国传统美学中“和”的观念历经了最早的“神人以和”再到现代辩证的统一的和谐等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美学理论体系。“和”的思想是古典中国哲学中在探究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总结出来的法则。早在《尚书》中就有“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等以和为美的美学思想。《乐记》中有“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先秦时期和为美的观念大多是从心理、生理、社会、人文等方面来总结研究的。孔子很早就认识到要把“和”的思想与社会的礼制和人民的教化联系起来，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春秋史伯和晏子进一步严格区分了“同”与“和”两个概念，即“同”是单纯的统一，“和”是杂多的统一。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比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